

SILEZHAI
SHILING

四樂齋拾零

郭延齡



郭延齡 著

讀書為樂
育人為樂
助人為樂
自得其樂



西北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四乐斋拾零

郭延龄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四乐斋拾零 / 郭延龄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5604-2520-7

I. 四… II. 郭… III. 郭延龄—文集 IV. Z4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244 号

四 乐 斋 拾 零

作 者: 郭延龄 著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273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80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25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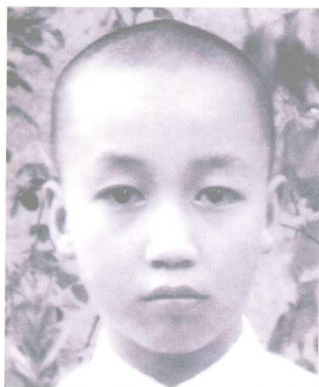
定 价: 39.00元



甘谷幼稚园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摄影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流亡到大后方的爱国青年在我家附近的山陕会馆办了一所幼稚园，我遂成了该园第一届学生，第二排右二即五岁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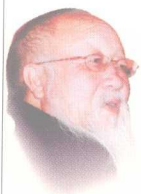


仁爱小学五年级照(1949年秋)



1948年，我的七位长辈合影。从左至右三爸郭名、大爸郭儒、小爸郭向、大姑郭翼、小姑郭潭、二姑郭睦、父亲郭峻

四乐斋拾零



作者大学毕业照(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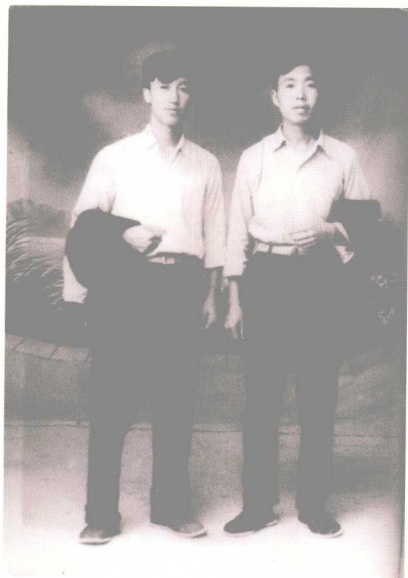
上世纪60年代全家福



访我的生命之根甘谷南山河沟娘娘庙。据外祖父言，母亲嫁到郭家饱受欺凌，多年不育，是他带着母亲在这里上了香、许了愿，母亲才怀孕生子，有了我。庙中大匾（已不存）就是他还愿时挂的。（1991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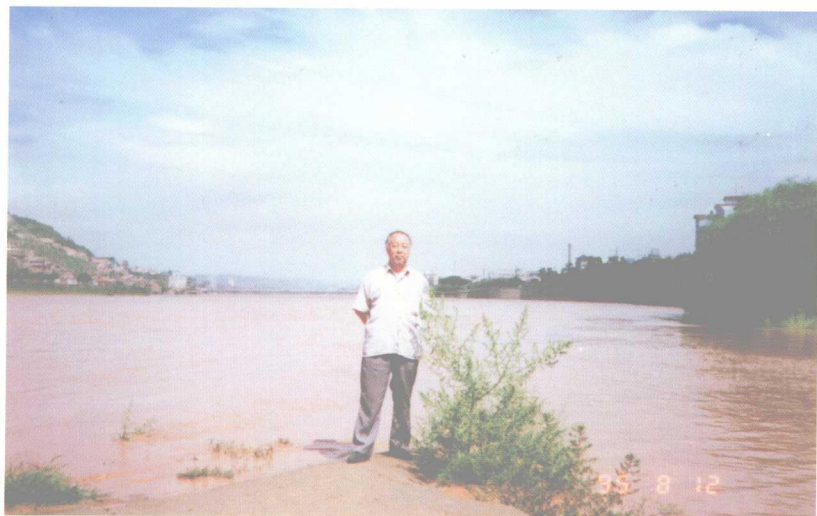
1981年夏，阔别15年后，我和郭惠林老师摄于北京西四



与情深义厚的周宝民同志摄于分手之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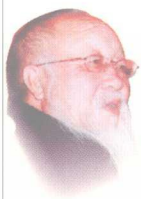


1994年，陪大学同班同学、商洛师专副校长郭敏厚教授游榆林红石峡



在母亲河黄河边（兰州，1996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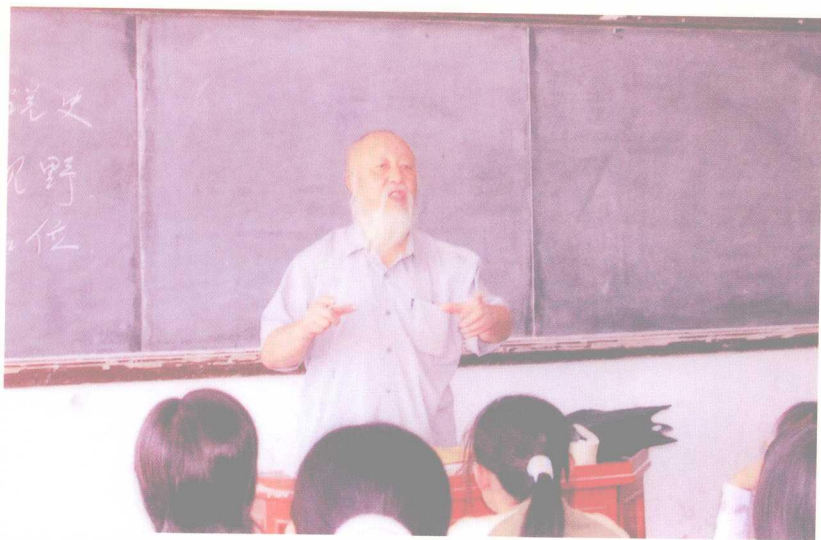
四乐斋拾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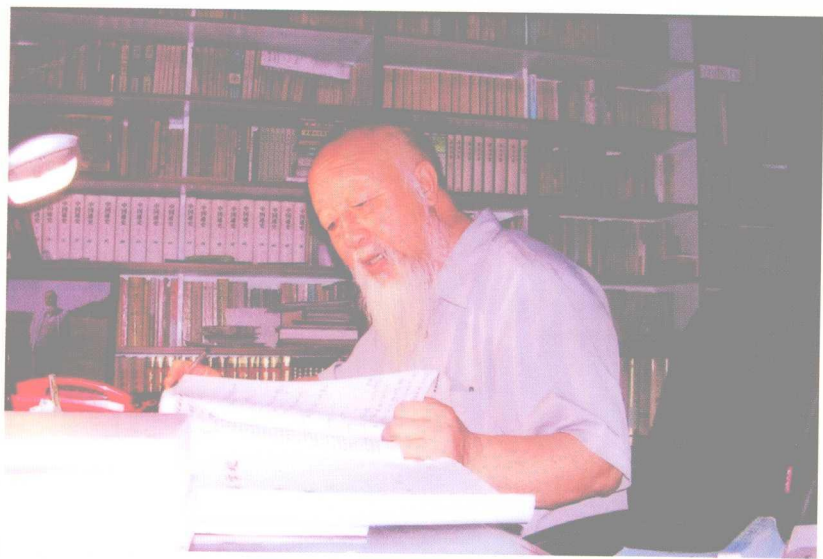
2002年冬，与中文系教授、党总支书记贾永雄摄于校园教学楼前广场



深圳街头留影 (2002年8月)



接受返聘，发挥余热（2005年9月1日）



认真备课，积久成习

四乐斋拾零

SILEZHAISHILING



坐拥书城，其乐无穷



督导听课，扶掖后进（2005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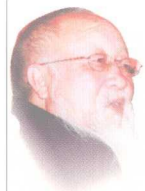


与陈士翔（靖边中学高74级、榆林高专中83级同学）、刘秀珍（靖边中学高75级同学）夫妇摄于榆卜界。后立者为他们的儿子陈尔新（1998年秋）



与梁宏贤（靖中高74级同学）、姬亚丽（靖中高73级同学）夫妇同游壶口瀑布。左立者为小女郭晓岱（1998年夏）

四乐斋拾零



与樊氏兄弟摄于榆林高专校门口。樊治中（右），靖边中学高75级学生；樊治国，靖边中学高79级学生（1998年9月）



与中83级焦伟（中）同学在一起，左一为常效东老师（1998年秋）

经典，登堂入室，何等惬意。

延龄最大的财富是学生！从1958年至今，他从未因私事（诸如伤、病、婚、丧等）耽误过学生一节课，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大约有六千人，遍布祖国各地。在学生中，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同师延龄，屡传佳话，甚至祖孙三代都以聆听过郭老师的授课为荣。延龄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交融于50年的从教生涯中，赢得了历届学生的称誉。延龄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几乎讲授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所有课程，并著书立说，撰写论文，积累了大量中国小说史、戏剧史的资料。延龄关爱学生，面对全体学生，对学生高度负责。《四乐斋拾零》中“学生心中的老师”一节，收编了19位学生撰写的文章；“来信摘录一束”选录了6位学生的书信片段。窥一斑而见全豹，郭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何等伟岸。学生敬佩老师知识渊博：“郭老师，永远的郭老师”“真人常露面”“有种滋味叫舒坦”；学生铭记老师的情意：“亦师亦友50年”“我师我友”“识才·爱才·助才”“失败和成功在一起”“恩师琐记”；学生颂扬老师童心永驻：“不老的郭老师”“我的童话朋友”；学生研究郭老师：“亲和赢得了学生的心”“从一个人的命运看一个社会的变迁”“融进心灵深处的爱”“一个拥有快乐人生的人”等等。这滋兰树蕙50年的个个中滋味，延龄是鱼游大海，冷暖自知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常常用金钱计算价值。可是仔细想一想，人世间最宝贵、最需要的东西却是不收取费用的。譬如阳光、空气与水，谁能离得开，谁又收取费用啦？譬如母亲对孩子的爱，半夜换几次尿布应该收取多少钱？还有师生之情，老师教书育人时那具体而微的行为，能用金钱计算吗？亲情、友情、师生情，其乐融融，都是无价之宝，一万年之后还是这样！

捧着《四乐斋拾零》书稿，手温尚存，快乐之情油然而生，原来快乐也是可以传递的。我们这一辈人，生在抗击日寇最艰苦的年代，在解放战争中拣过弹壳，新中国成立时扭过秧歌，大跃进时炼过钢铁，三年困难时期吃过代食品，文化大革命被触及过灵魂与皮肉，粉碎“四人帮”后流过热泪，改革开放以来也曾余晖闪耀。如此跌宕起伏的经历，目睹人世间电光石火的变迁，毁誉、颂扬、义愤、抗争，早已内化为精神财富，酸甜苦辣无怪味，喜怒哀乐不伤神，而今已是人生“无限好”阶段，心平气和，书海游弋，老友叙阔，含饴弄孙，这次第，怎一个“乐”字了得！

我与延龄的友谊，已近半个世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曾在靖边中

学执教,共事十余年,在语文教研组,朝夕相处,切磋教艺,可谓贫贱之交。在那谁也说不清楚的年代一块儿蹲过“牛棚”,一块儿戴过“黑牌”,一块儿同堂挨批;二十多年,虽远隔千里但书信往还、时有欣会,亦可谓交游频频,推心置腹。近日延龄嘱我作序,我深感情谊厚重,慨然应诺,顿时思如泉涌,汨汨而来,奋笔疾书,一吐为快,草就斯文,若有臆断粗疏之处,请延龄指正,谨此权作为序吧。

杨正泉 2008 年 4 月 10 日于渭南淡然居

写在前面的话

首先申明,编辑这本书,一不为出名,二不为图利。它是写给我的亲人、师友、学生作纪念的,是给我的子孙后代作留念的。

就我所知,我家自我以上的四代先人没有活过60岁的:高祖48岁,曾祖44岁,祖父19岁,父亲53岁。而我却有赖社会大环境的改善、科学的昌明、医学的进步和自己多年形成的以顺处逆、欲求不高的心态,活过了古稀之年。而且从1958年9月我初执中学教鞭始,很快就要在讲台上站够50年了。

半个世纪,不算短了,然而由于我智短才疏,进取心不强,所以数十年间,只是坎坎坷坷地走,兢兢业业地干,平平常常地打发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壮岁月。如今面对桑榆晚景,面对一生的无所作为、两手空空,回思众多师友、学生对我的关爱和期望,我深感赧颜愧疚。

既无鸿业伟绩可录可志,又无奇思美文可圈可点,那就以这本小书应景搪塞吧。

回想当年,我也是自视甚高,有过“野心”的。

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我时年12岁,上小学六年级。第二年上了中学,在那火红的5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我完成了中学学业。这期间我积极参加学校的文体活动。6年中,由给人当“孙子”到当“爷爷”,由群众演员到主角、导演,由一般成员到校剧团头头,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培养了我对戏剧的热爱。尤其从高一开始,经语文老师的指点,我如饥似渴地读了田汉、洪深、曹禺、易卜生、果戈理等中外名家的大量剧作后,自己感觉俨然是个戏剧通了。于是1956年夏高中一毕业,我即在几位老师的鼓励下,抱着当一个戏剧家的热望,冒险到北京去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说是“冒险”,一点也不过分。当时我只从报纸上看到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要招20名学生,其他一无所知。而且只凑够了去程的路费(回程路费是后来一位在兰州的亲戚资助的),便动身了。一个连电灯也没见过的僻壤土毛孩,一下子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京城,不知出了多少洋相。如不会开关电灯、不敢用

公厕马桶、不敢坐电车等等。幸而得到一位早几年迁居北京的同学帮助,才没误考。到那里一看,大吃一惊,招收20名学生,报了606名考生,且600人是全国各地方剧团推举来的青年演员,像我这样的“傻冒”应届生只有6人。所以初试一完,我们6个既无专业训练基础,又无临期充分准备的人全被刷下来了。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铩羽而归,结束了我当戏剧家的美梦。

在中学时期,我遇到了一批很优秀的文科老师。他们培养了我爱读爱写的兴趣。那时每次上作文课,我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6年间,我从未在两节课之外交过作文。记得初一时,一次我写了一篇长达16页的春游记,同学们给我起了个“郭八版(双页为一版)16片(页)”的外号。上初三时,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夸奖我的一篇讽刺散文具有鲁迅杂文的风格,我更是喜形于色。上高中时,我还有过两节课不仅完成自己作文,而且给周边四位同学说作文的记录。先是,为制约我的调皮,班主任老师在排座位时,在我的前后左右的,不是女同学,便是老成持重的男同学。他们都很听话、用功,但短于为文。为了改善周边环境,减少一些“小报告”造成的不快,所以我常给他们“说”作文。至于班上的墙报、黑板报,学生会五一、国庆、元旦的大壁报,每次都少不了我的文章。诗歌、散文、随笔,要什么写什么,要几篇写几篇……于是在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失败后,我退而求其次,决定发挥自己的所长,将来当一个写手、作家。

我的作家梦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主动放弃的。在当时,大而言之,我所崇敬的一批作家如冯雪峰、艾青等和一批与我同龄且被我视为楷模的青年作家如王蒙、刘绍棠等都被打成了右派,给我以当头棒喝。尤其对丁玲“一本书主义”的批判,使我深感文学罹祸的可怕。小而言之,就我们学校、我的身边、我的几位同学或因一张漫画、或因一篇散文、或因在笔记本上抄了一些外国作家的奇言趣语而自己在追查中说不清出处而被打为右派。他们后来的遭际都很惨烈。面对此情此景,我黯然神伤。自省家庭成分不好,社会关系有污点,文字之途不是我该走的。我的出路只有一条,老老实实听党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这样既改造了自己,也成就了下一代。

就这样,我的作家梦在一年多的反右斗争,一轮轮的批判、检讨中悄然放弃了。此后,我在工作岗位上除了写教案外,从未主动写过什么,连一篇日记都不写。1958年大跃进中迫于形势写过一些叫做新民歌的新诗,60年代初写过一些有关现代戏的诗词,再就是文革后期,写过一些批林批孔、评

《水浒》的文章。但都是随写随弃,不留遗痕,以致“文革”中红卫兵抄我的宿舍和家,除了一摞教案一束书信外,再无其他文字“罪状”。正如一位小头目所说:“郭延龄这家伙太狡猾,一百多条罪状,都是嘴上说下的,有文字凭据的只有两三条。”

写作激情的丧失,带来了手懒的坏毛病。长年的积习和惰性,使我的写作能力也萎缩了。后来要写一点什么,常有手生难以下笔之虞。现在即使放手让我写,也写不出像样的东西了,本书中的不少文字便是明证。

以上似乎是我对自己一生碌碌无为、一事无成所找的借口、遁词,但也是不能不说的实情。

500年前,我的先人由山西大槐树下迁到甘肃朱圉山下,成了陇南甘谷人。50年前,我只身背井离乡来到陕北长城脚下,如今已然是半个陕北人了。时至今日,我对生我养我的故乡依然怀着无尽的思念和深沉的眷恋,但我的儿女和孙子辈呢?他们对原籍故土有什么鲜活的具象和真切的记忆呢?他们已然都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了。现时,随着国家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地球村”也变得越来越小,人口的流动迁徙是朝夕之间的事。那么我的儿孙们的子孙后代又将身往何乡、魂归何处呢?因此,我要趁着自己目前脑筋还不大糊涂,且有一定的精力,有必要把自己的家世、家庭以及人生道路,作一个简单的小结、明确的交代,以上慰先人、下启后人,同时对关爱我的师友、学生们也算是作一简略报告。

这本小书,取名《四乐斋拾零》。

“四乐斋”是我的书房名,取读书为乐、育人为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之意。这“四乐”既是我一生的追求,也是我一生的写照。

“拾零”者指全书不是在完整的计划、丰富的资料、严谨的构思基础上写成的,而主要是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零零星星写的一些文字,以及有关师友、学生的部分文信汇集起来稍作归类编成的。我已经不长于文、懒于为文,再加上文革中的几次大查抄和近30年间的五六次搬家清理,本来不多的文稿所存更七零八落了。碎文琐记的搜集,是为“拾零”。

我再次申明,我编这本小书是为我的亲人、师友、学生作纪念的,是为我的子孙后代作留念的,因此不惮方家哂笑,就以这样的粗陋之貌面世了。

本书之所以成书、出版,得到了我的老学生、延安焦伟同志的热情鼓励、鼎力支持,特此致谢!

2007年11月25日